

## 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日) 樱庭弓子著，王惠敏译

—

1925年1月22日下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女师大)的四名学生赴教育部(相当于日本的文部省)请愿，翌日也就是23日，教育部以下列9条罪状为由更换了该校校长。

- 一、以教务会评议会之籍便私图，则废弃各级主任，而滥用员司。
- 二、以学校经费之充饱私囊，则违幸征收，而剥削寒酸。
- 三、硕学宿儒，以弄己而排斥之。
- 四、朽木榕杨，以私谊竟登庸焉。
- 五、学生以爱憎为优劣。
- 六、市恩而代缴学费，利诱学生。
- 七、其尤倒行逆施者，则舞弊营私，破格收生。
- 八、溺职虚应，徒事敷衍。
- 九、头脑冬烘，居心残酷。

从此段文字看来，这个有许多问题的人物就是1924年2月坐在中国最早的国立女子大学校长座位上的杨荫榆，她的前任校长为许寿裳。

早些时候，中国各地大学纷纷出现了校长更迭事件，围绕此事，各学校的校园中也发生了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在1925年5月7日，女师大举办“国耻纪念日”的校内讲演会上，由于学生拒绝校长入场至使校方对为首的六名学生作出了令其退学的处分，矛盾进一步扩大，从而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正如大家所知，在这次学潮中，以鲁迅为首，以国文系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女师大教员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校长和支持她的教育部发生争执，又与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冷漠态度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新的论战，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女师大风潮”。当时的问题人物杨荫榆因与鲁迅敌对而被放置于反动校长的位置上。

女师大风潮之后的8月1日，自国耻纪念日起就不入校园而居住于北京某饭店的杨校长竟然在武装警察的伴随下强行封锁学校，但也以失败告终。在与支持学生的教职员工所组成的校务会的对峙中，教育总长章士钊有了新的设想，废除女师大，创建女子大学。于是，围绕着女师大留存问题持续了近半年的纠纷，最终以承认两所大学共存而宣告结束。章士钊辞任教育总长后思想逐渐转化。学潮之时的中心人物杨荫榆校长则于8月封锁大学事件后递交辞职书。教育部在决定接收女师大和创立女子大学的会议上受理批准她的辞呈，8月7日那天，她辞去

校长职务，离开北京去往故乡苏州。9月6日的《晨报》上刊载了她向教育部递交辞职报告的情况。从此，杨荫榆这个名字便从报纸上消失了。

杨荫榆从女师大走出后又怎样了呢？根据中国鲁迅研究界的调查，现已确认杨荫榆于1938年被日本士兵杀害的悲惨事实。

我们如果从鲁迅研究的立场去讨论周围的人物，也许了解个大概即可。但对待历史上有的人物，研究他们在特定的时间中的行为言论，以特定的理论评价的话，观点往往容易陷入片面。以生活在充满矛盾的时代，又有着充满矛盾的个性的人物为对象进行研究，更不能只观表面现象，有时应该注意和研究看不到的不重要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杨荫榆这样的人物，在历史的一瞬间浮上来，而后又突然从历史上消失，就其人其事来看，从多侧面观察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当我读到作家杨绛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所写的回忆录《回忆我的姑母（即杨荫榆一作者注）》时，更有这种感受。

## 二

杨荫榆1884年（光绪十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个小官吏家庭，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比她大六岁的兄长杨荫杭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东京成立了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这位有进步思想的兄长还在日本留学期间，家中以门当户对为由把杨荫榆嫁给了一个低智能的少爷，因父母宠爱的长女幼年丧命，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位模样不够漂亮的女儿杨荫榆，后来，杨荫榆又因在婆家抓了对方的脸等事件引起波动，很快又回到了娘家。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归国后，她回到了兄长身边。杨荫杭与同乡共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男女混合学校理化会，不久在苏州开设教会学校，杨荫榆进入景海女学堂。

当时是1902年，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外国很早就着眼于女子教育，并成立了妇女团体和以布教为目的的宣教团。1825年新加坡就开始为女子设立学校。鸦片战争以后，自广州、澳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通商至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也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葑门附近的天赐庄。

虽然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但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在该校学习两年之后，

又转入中国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之一——上海务本女塾学习。

这个 1897 年以私塾开始，1902 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塾的女子学校，同 1902 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座为社会培养女性作出努力的私立女子学校。据说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当时学生 150 多人，是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校。1907 年，杨荫榆毕业于该校中等部，届时参加毕业典礼仪式的人达 500 余。上海杂志上曾发表了该校女子教育兴盛的报道。该校教育内容充实，特别是师范、中学各科取得了很大成绩。杨荫榆 5 月从该校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 月启程去往日本。

杨荫榆全然没有做贤妻良母的念头，其侄女杨绛在回忆中讲述，拒绝父母无理强逼的婚姻生活，冲破旧社会家庭束缚，走向社会的杨荫榆的确是不从属家庭的独立的女性。在曾一度幻想君主立宪制度的兄长的思想影响下，她心中也描绘着近代国家的理想图画，也许那时的她就立志为其效力吧，那正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

1907 年 1 月 24 日，也就是杨荫榆到日本留学的 5 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8 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26 条。至此，长年被忽视的女子教育才建立了制度，规定了法令。当时由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要培养不外国奴隶的优秀人材，就必须对母亲进行教育，这是政府的方针。女子教育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作为妻子要扶助丈夫，作为母亲要教导孩子”的女性，从而女子不需要特殊的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行了。因此，女子的学制与男子不同，最高教育机构是师范学堂，没有必要设置中学以上的学堂。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等。师范学堂的年限也比男校短一年，是四年。

政府的教育方针是把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为了这个目标，各地都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为充实其师资队伍，女子公费留学的大门也打开了。杨荫榆参加的江苏省留学考试也被列入培养师范学校师资队伍的一个途径。

对于贤妻良母，杨荫榆不屑一顾，但她相信自己能够为提高女子地位作出贡献。然而当她亲自担负起教育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并为之努力时，则又不自觉地成了贤妻良母主义者和被批判的对象。观其历史背景，则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正从封建社会脱离，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试图从各方面进行改革的时期，女子教育首先不是人格教育，而是依附国家权力的家庭制度所支配的对妻子和母亲的培养，这也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

像杨荫榆这样的经过出国留学，接触过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知识女性，也经过辛亥革命教育制度从男女分校到男女同校的改革洗礼，又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们相比，在妇女

解放这个思想基点上是一致的，都符合时代潮流。但对“解放”这个问题在思考方法上有微妙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会酿成很大的问题表现出来。其中一例，就是杨荫榆这位具有姑息思想的人遭遇“女师大风潮”，被急进的具有新思想的女学生所排斥。

根据记录，杨荫榆 1907 年 7 月到达日本，两年后的 1909 年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专攻理科，四年后的 1913 年毕业。她的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这就说明，到日本学习时才 22 岁的年轻人杨荫榆恐怕是全力以赴地学习日语，接受进步的教育方法。也可以说她人生观的形成是在二十年代的前半期，这给予她后来的人生历程以很大影响。1911 年掀起的辛亥革命对正处于学习期间的她有什么影响呢？目前还不清楚。也许作为学生，在校方制定不谈政治的学校里，大多是服从的。毕业之际，她以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别针。

1913 年，归国后的杨荫榆迎来了苏州女子师范教务主任的职务。翌年赴北京，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数理化教授兼学监主任。当时这位棕色皮肤、修长体型、两眼发亮的杨荫榆在校内很有威信，在学生中也很有缘。她于四年之后的 1918 年作为中国政府派遣的教授团，也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去美国。杨绛的文章中记述了她出发时的情景。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根据杨绛的叙述，杨荫榆并非天足，但穿上合适的鞋，就看不到放开的缠足之脚了。青年时代的杨荫榆善长语言学，又很幽默，在学生们眼里，她不是出嫁后受欺负的姑娘，而是燃烧着理想之火，富有魅力的女教官。

被许多学生和同事送行的杨荫榆到美国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研究教育学、数学和应用化学。五年后的 1923 年得以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任女子高等师范英语系主任，第二年被任命为校长。就在这一年，女子高等师范升格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她成了中国早期国立大学女校长。当时杨荫榆 40 岁，这种荣誉和地位是她从被迫结婚的家中跑出，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所得到的。

### 三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讲道，“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对杨荫榆来说，也同样碰壁了，她的思想偏激，见解不实际，她碰了新时代的壁了。那么她的思想又自觉到什么程度呢？

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植人材恪尽职守为素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去年三月，蒙教育部之敦促，承乏斯校。任职以来，对于校务进行，必与诸同人协议熟商，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惟荫榆秉性刚直，不善阿附，有时处理事物，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与人者，但即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毁之劳怨，所不敢辞，至于个人进退，原属无足轻重，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学风计也（按本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

从辞职前的声明中可以看到，杨荫榆认为自己受国家培养多年，要把整顿被搞乱的学风作为己任，并为此竭尽全力。也许直到“女师大风潮”的最后，她都坚信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正在为本国的近代化推进工作服务吧。

1912年，民国成立后的9月4日，教育部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这是初级小学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制，但关于女子专门学校或大学却没有规定，对女性的教育一直延续的是社会缩小为家庭式的教育方法，离不开历来女子教育观的桎梏。在以女性能够出入社会为前提的男女平等教育观上所建立的学制，实际上是经过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后的1921年。

自杨荫榆1913年从日本归国又到美国旅行的1918年间，中国仍是男女分校，重视“高品位，固贞操”的修身养性的女子教育观的时期。

例如，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学监”的1916年，教育部试图整肃学校风纪发出以下通告。

……各省女校往往自有风俗，衣裳装束自由随便。如取缔未见能达统一，在此特定惩戒规则五条：一、禁剪发，违者退学；二、禁天足，违者退学；三、未经许可禁止示威游行，违者记过三次；四、走读生必须超过十四岁，隐瞒者记过；五、禁止自由结婚，违者退学并向校长引咎。

这里明确规定男女有别。此种教育制度与国家统治阶级的制度相吻合，是为培养治家的顺从女性为方针而出示的。此规定也正合杨荫榆之意。对短发女性的敌视，厌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严禁男女交际的杨荫榆便以此为治校之方。她曾向学生和家长说，“学校犹家庭”，“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今日女子教育，道德与知识并重”等等。她的语言重复了当时要把女子

培养成贤妻良母式人物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无论如何，在美国学习教育，与杜威有着交往的杨荫榆不是单纯为培养家庭主妇而工作的。作为培养目标，她是以自身经历显示女性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位置为经验来考虑培养人材的。然而，当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她的思想与国家主义色彩浓厚之时的政策是一致的。

实际是好人，但循规蹈矩。例如在女师大，住校生必须在外过夜时，须先由外宿地责任者出示证明，得以允许后方可在外过夜，这样死板的规定当然会引起追求思想解放的女学生的反感。怨恨多了之后就会形成一触即发的状态。

正如后来所说，杨荫榆见到的是“女之国”中的秩序。这样，旧时代的“自由保守”和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认为旧秩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新思维方法围绕着男女交际问题也尖锐对立起来。杨荫榆被认为不合作校长是由多种因素所致。她越忠实自己的职责，就越加深与学生的矛盾。她与学生分歧的根本在于时代的差别。

学生们称她为无知无学之徒，其根据是她曾说过“国民之母之母”、“全国教育之母之母”等。然而这些话正是清末女权运动盛行初期的语言，人们在说话时也常把“女子为国民之母”搁置语句之首。虽然并非“无学”，但在1924年女权运动已成为高潮的形势来看，此种话语是不合时宜的，可她自己却没有发觉。正如杨绛所说，“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杨荫榆的不幸是她当时还在国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两次大的变革未能亲身体验。她要把留学中所见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也是充满矛盾的社会）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真犹如碰壁一般。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各国，都是以资产阶级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的。把这一套放在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中国则是幻想。统一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必要建立一定的秩序，必须清除破坏这一秩序的因素，基于这种观点，她认为学生运动、政治运动，以至于革命的行动都是“秩序混乱”，在这点上，她与和她同样把欧美制度理想化了的“现代评论派”是同出一辙的。

她认为国家繁荣昌盛在于优秀人材的培养，教育是左右国家兴亡的神圣事业，在危急之中培养为国效力的女性人材是自己刻不容缓的责任。当时中国处于混乱状况，怎么能推进近代化呢？作为认真思考的众多的知识分子之一，杨荫榆煞费苦心地考虑着国家的未来，可以说是被蒙上眼睛的唐·吉诃德。

8月2日是女师大风潮的高峰日，这天晚上，由于警察拒绝干涉学校，杨荫榆彻底失望了。直至事态发展到封锁大学，思想上都很强硬的杨荫榆此时开始验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两天后，她说，“近年来，政府把教育事业看作是多余的，

也没有恢复学校秩序的决心和能力，有这样的政府，本校风潮必然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也成为她辞去校长职务的理由之一。她办理完辞职手续，于当年秋天颓然回到故里苏州。

虽然她就任女师大校长后被称为“落水狗”，但她回到苏州继续在苏州女子师范工作，后又在有教会学校历史的东吴大学任日语和教育学教授。总的来看，精神上像是失去了锐气一般。围绕学生处理问题，她与校方产生矛盾辞职后，决心自己创办学校。不久，在日本军占领下的苏州被杀害了。

#### 四

《回忆我的姑母》中描写回到苏州的失去锐气的杨荫榆时有如下情景。

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亲叹气说：“嘻，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简慢了客人。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青年时期曾是女权运动鼓吹者，后来又登上最高地位的女性优秀分子，怎么成了“一个伤残的心灵”呢？从杨绛的概括中得出结论，“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时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她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时代的一个悲剧。

（〔日〕樱庭弓子著，王惠敏译，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02期。）